

贫困研究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再思考

梁柠欣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本文从学术发展的角度, 简要回顾了以往贫困研究的两种社会学解释范式, 并对其中蕴涵的方法论进行批评。随后提出了从结构嵌入的视角超越以往贫困研究范式, 以社区与个体为切入点, 研究城市贫困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贫困研究; 解释范式; 结构嵌入; 社区结构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对贫困现象产生问题的解释, 既是理论问题, 同时也关系到如何治理贫困的实践。本文将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 对以往城市贫困研究的解释范式及其蕴涵的方法论进行述评的基础上, 提出城市贫困研究的新视角。

一、城市贫困研究两种的解释范式述评

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 对贫困产生问题的解释, 早期主要有个人学派与家庭学派的解释。早期的社会学家例如布斯(Booth)、朗特力(J. Rowntree)等人主要从个人和家庭角度分析城市贫困产生的原因(参见斯皮克尔, 2001; 刘玉亭等, 2003)。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 许多社会学家开始对集中关注贫困者的个人和家庭因素的解释开始不满, 于是贫困的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应运而生。

贫困的结构取向解释将贫困归因于既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 认为贫困源于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占有, 是一种“经济力”和“社会力”共同作用的产物, 这是一种将贫困归咎于社会, 谴责社会的解释框架(周怡, 2002)。马克思认为, 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度(经济结构)是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 贫困是由于社会角色分工造成的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产物。基于社会角色分工不同而形成的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权力结构是一种社会常态, 由此不平等的结构所派生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也是普遍的、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转自周彬彬, 1991, P.72-73)。经济学家同样认为, 贫困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而导致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局部、偶然失调的产物, 因此市场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失业、贫困也是不可避免。事实上, 在结构-功能主义者看来, 贫困是社会经济正常运作的产物, 具有维护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正功能。经济学者也认为, 贫困具有调节劳动力供求的功能, 即市场本身需要贫困(参见关信平, 1999: P.51-52; 周怡, 2002)。

总之, 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结构-功能主义解释中, 贫困是既有的、不平等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的产物, 贫困是既有的社会经济正常运作所呈现的功能, 是一种社会常态。因此, 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贫困解释框架中, 任何从结构角度提出的反贫困政策是不可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的, 有时也是不必要的。在既有不平等地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下产生的反贫困政策充其量只能缓解贫困的程度而已, 而难以彻底治理贫困。

与上述将贫困归咎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不同, 贫困的文化解释范式将贫困的成因归结于个人。在刘易斯(Oscar Lewis)、E. 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等人看来, 部分群体(地区)之所以走向贫困, 在于其群体(地域)存在着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脱离的、格格不入的贫困文

化(非道德性家庭主义)。这种贫困文化包括屈从意识、不愿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等,或者利己、家庭本位、排斥集体合作。而且,贫困文化可以通过贫困群体的内部交往而得以世代传递,从而使贫困者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参见周彬彬,1991,P.81-83;关信平,1999:P.55-60;周怡,2002)。总之,在这种谴责穷人的文化解释框架中,流露着这样的观念:贫困者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其拥有与众不同的亚文化。因此,贫困者要摆脱贫困,就必须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然而,由于贫困文化具有内生、自主发展的特性,因此在班费尔德看来,“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以改变贫困的可能”(转自周怡,2002)。哈瑞顿的“贫困代际传递”论和 D.P.莫伊尼汉的“贫困恶性循环模式论”(参见段敏芳,2002)都表明,贫困之所以具有世代传递性,在于贫困文化具有再生产贫困的特性。

贫困研究的结构和文化两种解释取向受到许多批评。其中,结构的解释由于过多的关注外部因素而对个体能动因素关注不足而受到批评,而贫困的文化解释框架又因存在概念的含混不清及逻辑上的矛盾、研究资料的不恰当、研究方法缺失,以及过度强调了导致贫困的自身、心理和文化因素而忽视了有可能导致贫困文化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政治条件等等缺陷而受到指责(周怡,2002;关信平,1999:P.55)。随后,美国学者在对芝加哥(Duneier,1992)、费城(Nightingale,1993)、纽约哈莱姆(Newman,1999)等地区的内城黑人居民(包括青少年)、贫困居民的研究均发现,以前对贫困居民的文化解释多少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对贫困文化的产生也缺乏从结构探讨的深度。C.瓦伦丁和 H.罗德曼等学者指出,贫困文化之所以在家庭世代延续,是因为贫困者面临着同样的社会经济问题,是外部环境决定了贫困文化在家庭的延续,而不是相反。一旦环境改变,穷人的行为、价值观(贫困文化)也随之改变(参见周彬彬,1991:P.85-86)。而 WJ.威尔逊(WJ Wilson)则从个体所居住的社区的结构变迁的角度探讨贫困文化产生的机制。在他看来,贫民文化(Ghetto culture)产生的过程,实际上并非是一种自主的、持续的反社会亚文化的代际传递及其内化的过程,而是社区的集中贫困及其产生的社会孤立的结构性产物,正是社区的集中贫困及其导致的社会孤立促使了穷人的适应性策略(贫困文化)的产生(Wilson,1987)。换言之,贫困文化只是这种个体的外部结构变化的产物,或者如甘斯所说贫困文化只是“一种结构变化的情景反应,是穷人面对经济、政治和信息排斥等穷人必须面对的约束条件和激励条件的行为反应”而已(转自 Rakin & Quane,2000)。

二、贫困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及其批评

贫困的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之所以各执一端,其原因在于受到其背后的方法论影响。事实上,如果我们对贫困的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模式的产生的方法论根源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这两种解释模式实际上是既有的社会学实体论方法论的产物,其背后隐藏着明显的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冲突: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对立。

在传统社会学研究中,明显存在着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对立:在社会学的方法论中,要么是以个人行动解释结构,要么是以结构解释个人行为,从而形成了社会学研究方法传统中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对立(韦伯,1987;迪尔凯姆,1997;刘中起、风笑天,2002;周业勤,2004)。在这两种方法论的背后,实际上都隐藏了本体论预设:在个体主义方法论那里,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无须验证的理论预设:行动者是具有行动能力的个体(个体本体论)。因此,社会现象只能通过个体行动来解释,而个体行动则无须通过社会来解释。而在整体主义方法论背后则隐藏着社会本体论的预设,即社会本体是所有解释的出发点,因此社会自身不能由个体行动而仅能以社会整体加以解释。这种实体化、单向度解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致使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境地,并由此演化出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对立(参见刘江涛,田佑中,2003;周业勤,2004)。

贫困的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即是从上述对立的社会学实体论出发的产物。借用 A.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话语,这两种解释模式实际上是社会学传统的二元对立本体论在贫困研究领域的再现:

首先,“强结构而弱行动”的结构解释范式中,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的解释,实际上都隐含这样的观点:贫困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产物。“几乎结构的方方面面,都会引起和制造贫困,而且结构的调整不能真正解救贫困”(周怡,2002)。在这种贫困的解释的背后隐含着社会本体论的假设:结构是外在于个体活动的实体性存在,“是完全先验的”,以吉登斯的语言说,就是社会结构在形成过程中“主体的不在场”。在这种本体论的后面,实际上也隐含这样的价值判断:贫困是结构的产物,结构是贫困形成的根源,个体的行动完全受制于外在的结构而不是参与结构的建构,个体对这种外在的结构制约是无能为力的。因此通过个体行动,经由调整结构对贫困加以治理不仅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贫困现象是社会的常态,具有一定的社会正功能。于是,行动者个体在这种结构约束之下只能是消极被动的,只是按照结构制度化过程中所内化的角色规范来行为,个体的行动没有主观能动性,其行为完全被社会期待、规范所限定,个体的差异已经被忽略了,不再是被解释的因素了,于是个体成为格兰诺维特所说的“过度社会化”的个体(转自周雪光,2003:P.120),而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却在结构建构过程中消失殆尽。

其次,在“强行动而弱结构”的文化解释范式中,认为只有通过对部分人(贫困者)的行动才能解释贫困现象:通过贫困者的行动而产生不同于社会主流价值的贫困文化,而这种由于贫困者的行动而产生、内化的贫困文化具有自主性,具有生产与再生产贫困的特性。实际上,在这种文化解释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本体论假设:贫困者是能动的、自由的、不受结构与制度约束的“自在”的个体。由此产生的一种不言而喻的价值判断是:贫困是贫困者自主行动的产物,贫困是贫困者自我选择或者是贫困者行为选择的结果。在这种“谴责穷人”的文化解释框架的背后或多或少潜藏着对穷人的歧视,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等等(参见周怡,2002)。由此可见,在贫困的文化解释中,在承认个体行动具有自主性的同时,也拒绝了外在于个体的结构对个体行动的影响:个体的贫困只是个体行为的产物,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与外在的结构无关,个体的行动不受外在于个体的制度等结构因素的影响。个体的贫困是其文化选择的产物,而非结构与制度的产物,个体的行动不受外在个体的制度与结构的约束,从而个体只是一个如格兰诺维特所说的“非社会化”或“社会化”不足的个体而已(转自周雪光,2003:P.120)。

尽管贫困研究的文化解释和结构解释出现了某些程度的统一、融合趋势(周怡,2002),例如,作为一个结构论者,WJ Wilson 对底层阶级产生的解释是在结构的解释框架内进行的,从总体上拒绝 Lewis 的贫困文化理论,但是他的解释仍然带有一定的文化解释意味,即呈现结构的解释和文化解释两种范式的结合特点:他在肯定缺乏工作机会是内城黑人走向赤贫背后的最终原因的同时(结构的解释),也认为长时间的失业、集中化贫困将使内城居民产生较低自我效能,使得他们即使在经济状况好转时也难以把握好机会实现就业(Wilson,1987),这实际上暗含文化解释的含义。事实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要对自我效能是如何扩展的,以及哪些因素约束其变化等问题进行追问时,那么贫困者的特定亚文化和行为方式将无法避免地需要纳入考虑范畴(Small & Newman,2001)。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贫困研究的文化解释和结构解释从根本上仍然是两种对立的贫困的解释范式。在文化解释范式中,行动者是自主、能动的,结构(文化)是个体经过自主行动所建构的,而结构对个体的行动是无意义的。该范式关注的是那些主要由规范衍生的穷人们已经习惯的内在因素:个人的动机、信仰、生活态度、行为特征和心理群像等等对贫困的产生、发展的影响,认为这些因素参与了贫困文化的建构,而正是这种独特的贫困文化塑造了贫困并使贫困世代延续。然而,这种解释范式却对现实中大量的由制度或政策派生的导致

贫困的因素，例如市场机会、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种族主义、结构变迁等等视而不见(周怡,2002)，即外在于个体的结构的制约作用被忽视了。

而贫困的结构解释范式则是社会学结构主义思维逻辑的典型产物：贫困是结构的产物。而在解释人的行为如何受到结构的制约时，通常以人的所属类别来对人的行为加以解释。在这种观点指导下，社会研究关注的是人们属于哪个阶层，具有何种特征(年龄、性别等)，是否占有某种资源，占有多少资源等问题。例如马克思在解释贫困的产生时，使用资源占有(生产资料)的分类方法区分资产/无产阶级，正是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导致剥削行为的产生和贫困现象的产生、延续。其他经济学的贫困结构解释也有类似之处。而在强调结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对贫困的塑造作用同时，个体行动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则被排除在外。从而，在贫困的结构解释逻辑中，结构如何产生的问题成为一个无需证明、先验的命题，行动者在结构产生中的作用则被抹杀了。也就是说，贫困的结构解释实际上就是一种地位结构观的产物。但是，在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和格兰诺维特看来，这种分析方法使我们难以看到社会结构的全貌从而产生理论误导(边燕杰,1999)：例如，为什么社会地位相似的人生活状况呈现较大的差异，有的陷入贫困，有的则相对富裕？

三、城市贫困研究的新视角：从地位结构观转向网络结构观及其结合

在面对相同的议题和相同的事实时，贫困的文化解释和结构解释往往有十分不同的解释，呈现出一种对立的关系。贫困的文化解释和结构解释的对立的根源在于将研究方法论实体化、本体化了，从这种本体论出发，必然产生要么从结构的角度，要么从文化角度的对立的贫困问题的解释范式。“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忽略任一面的解释，或倚重某一面的解释都会有失偏颇”，因此，要“真正理解贫困，需要文化与结构解释的结合”(周怡,2002)。然而，这两种范式的结合，不能够从周怡(2002)所言的视角、理论解释的结合所能捏合在一起的，而应当从方法论以及方法论后面的本体论方面进行消解，即彻底消解两种解释范式的基础才能够实现。也就是说，要实现这两种解释的整合，必须超越贫困研究的文化解释和结构解释背后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对立，彻底抛弃隐藏在方法论背后的本体化、实体化的思维方式，从关系的角度而非实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个体、社会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布迪厄在反对方法论的二元对立时，大力倡导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他睿智地把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题改写为“存在的就是关系的”(布迪厄、华康德,1998:P.133)，并用关系性的“场域”和“惯习”概念分别取代被本体化了的社会整体和个体，以场域、象征性实践、习性(惯习)、社会制约条件、资本等几个概念建构了场域结构理论的核心框架。他指出，社会结构是由具体的社会场域构成的，“场域”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构成的，在这个多维度的社会关系网络所构成的互动(竞争/交换或权宜)的空间里，参与者在场域中通过互动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种类和数量，部分或彻底地改变资本的分布结构和不同位置间关系的结构，从而改变了场域结构。而惯习是人的一种精神的或认知的结构，是一种可以产生结构的结构。惯习是创造性的，属于个体的能动性方面，能体现个体的想象力，但又受限于其结构，这些结构则是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惯习和场域是双向社会生成过程，它们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场域为实践提供了场所。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又反过来赋予场域以意义并建构场域。也就是说，惯习和场域之间的双向生成过程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真实逻辑(布迪厄、华康德,1998；郭毅等,2003；周业勤,2004；李全生,2002；萧俊明,1996)。

吉登斯反对将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看作是既成的、僵固的外在性对立，而认为应该看成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具有内在统合、共生互动的双重建构性关系。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代替二元论(dualism)，以结构化理论破除和消解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在他的结构化理论中，行动者是具有知识的、引发行动的自主个体或者群体，具有能

知和能动的特点。结构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同时,结构又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作为能知和能动的行动者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能够不断地认识、利用各种规则和资源,并且在各种实践活动中生产和再生产出规则和资源,因而结构既不断融入实践活动之中,成为行动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在实践活动之中被再生产出来,成为行动的结果。换言之,行动是在循环往复的日常活动中被结构化的,而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的。一言以蔽之:“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制约我们的世界”(吉登斯,1998:P.89; 特纳,2001:P.170-173; 黄平,1995;李猛,1996;侯钧生,2001: P.335-336;周志山、许大平,2002; 刘江涛、田佑中,2003; 李红专,2004)。

吉登斯和布迪厄的观点对我们的贫困研究方法论的建构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消除贫困研究的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对立,就必须抛弃本体化、实体化的思维方式,从关系论而非实体论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行动与结构的关系,从静态的社会地位结构观转向动态的网络结构观,从而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与静态的、强调个体既有的教育与经济结构出发(本体论)的地位结构观不同,网络结构观从关系论出发,认为作为社会人的个体,总是与生活环境中的各个群体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是联系(ties)将不同的个体连接在一起,这种个体(个人、组织)与其他个体(个人、组织)之间的联系、接触、交流、交换,都会对个体(个人、组织)的行为产生影响(边燕杰,1999:P.111)。因此,从关系论出发而不是从个体或整体的实体论出发,就可以消除行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

从关系论出发,贫困个体都是理性的、能动性的主体,都是与他人发生或多或少联系的个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贫困个体为了满足应对生活、摆脱贫困等利益需求,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机遇,而有意无意地与其他个体、组织(尤其是那些可以为自己带来直接或间接利益的主体)发生联系,并通过象征性建构,即利用现有体制与其他个体、组织进行接触、交流,进行物质与非物质交换,从而使偶然的关系得以持续稳定,进而形成相对固定、制度化的联系纽带,这种联系纽带即网络化的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能动的个体通过互动(接触、交流、交换等)参与了网络结构的建构。而个体行动者也可以经由建构的网络关系,从不同的网络关系中获得不同资源而部分地改变自己的资源拥有状况,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影响个体未来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个体参与了网络结构的建构,而个体行动又受制于其所建构的网络结构,从而克服了文化和结构解释中的个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对立。

与地位结构观不同的是,网络结构观并不看重个体既有的社会属性(性别、阶级等),而是看重个体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关系;不再将个体看作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看作是网络中与他人不断发生联系的个体;不再强调个体的现实资源占有,而是关心个体对网络中的资源摄取能力(边燕杰,1999:p111):如果个体在网络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与异质个体联系多,那么即使他现在一无所有,但是将来他可能从其网络中获得更多有益的资源。而这个经过建构的网络所获取的资源集合体,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社会资本。科尔曼也认为,个体通过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具有生产功能的个人资源,可以为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他认为,这种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带来收益的社会资本概念既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又可以实现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可以消除行动与结构、个体与整体、微观和宏观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对立(科尔曼,1990:P.330-336)。

总而言之,网络结构观和地位结构观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分析的两个方面,两者实际上是互补的关系(边燕杰,1999:P.113)。在贫困研究中,通过这两种地位结构观的结合,可以使我们看到,个体的生活机会改善既受到业已存在的地位结构的影响、制约,同时个体实际上也并非被现存地位结构限定的个体,而是一个能动的个体。个体可以通过与其他个体及其集合体(组织)的互动,形成新的网络结构,并且从中获得有利于生活改善的资源,这种通过网

络结构所获得的资源即社会资本。

四、结构嵌入与城市贫困研究的切入点：个体与社区的视角

新经济社会学对“嵌入性”问题的研究为经济行动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边燕杰,1999:P.118-120),促使人们不管从何种角度研究经济行为时,都必须仔细考察经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限定着经济行动)以及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间的具体互动(桂勇等,2003)。

就我们研究的贫困居民而言,其追求家庭贫困缓解的行动是嵌入在多重结构之中的:一是受到其业已形成的地位结构的影响,这是微观层次的结构嵌入。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已经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将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福利追求行为及其结果,这是地位结构观的解释。二是受到其居住的社区结构变迁的影响,这是中观层次的结构嵌入。贫困居民的社会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既受制于其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同时也受制于其居住的社区结构。个体的既有的地位结构因素与其所在地的社区结构因素共同构成了个体与他人、组织互动的机会或限制条件,共同影响其通过互动形成的网络结构的规模及其构成,这是网络结构观的解释。按照Wilson(1987)的社会孤立论的解释,个体生活所在的社区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个体行动的机会与限制条件,生活在不同社区的居民具有不同的生活机遇。其原因在于,个体所在的社区结构将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及其嵌入的资源,以及通过其他机制影响个体获取有利于发展的资源,从而对居民的行动及其结果产生影响。三是个体的所有行动均受制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结构,这是宏观的结构嵌入。这种观点在贫困的结构解释中已经有较多的阐述,不再赘言。

基于结构嵌入的观点,我们拟在结合宏观制度结构的前提下,采取个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双重视角,研究城市贫困的产生及其治理。这种双重视角具有以下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首先这种双重视角可以揭示贫困产生的微观与中观原因。通过个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双重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在贫困产生、贫困缓解过程中,个体业已拥有的地位结构因素及其所在地域性社区对个体贫困的产生、贫困缓解中的相对作用。这种探索,从理论上有助于我们对倪志伟(Victor Nee)的市场转型理论(转自边燕杰,2002:P.18-21)的对象适用性¹进行检验,另外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对社区在个体生活机遇的建构作用再认识,毕竟对个体所居住的社区与个体生活关系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空白。

其次,从理论上既可以对社会孤立论进行检验,同时也可补充、完善个体的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问题。WJ Wilson(1987)的社会孤立论产生后,有关社区效应的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Small & Newman,2001; Sampson et al,2002; Shinn & Toohey,2003)。但是,从整体看,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社区效应的研究基本处于相关关系的发现阶段,对社区效应的作用机制问题仍然难以回答(Small & Newman,2001; Ainsworth,2002; Jnecks & Mayer, 1990:P.115;Farrel et al,2004),导致在社区效应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某些命题,例如Wilson的社会孤立论也有待于进一步验证(Ainsworth,2002)。同时,社会资本来源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关注、补充完善的理论问题。自从社会资本概念产生后,利用社会资本概念研究社会政策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时髦。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社会科学研究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改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应当象发展其他资本一样,发展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然而,目前个体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解释基本局限于基于地位结构观派生的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的解释(例如边燕杰,2004),同时其研究对象也仅局限于普通的居民,对部分特殊群体的社会资本来源、个体居住的社区结构变迁对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不予以关注。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与贫困的系列研究曾经朦胧发现,个体的生活机遇可能与社区有关,认为个体的社会资本可能通过社区而对个体的生活产生作用(Narayan & Pritchett, 1999; Grootaert,1999;Grootaert et al., 1999;Grootaert & Narayan,2000;Grootaert,2001),

但对社区与贫困个体的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仍然未能作出理论解释。换言之，原有的个体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解释，基本上是以普通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基本上以地位结构观派生的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进行解释，而忽略部分特殊群体，同时对其居住的社区结构变迁与其社会资本产生的作用缺乏关注。因此，如果我们从结构嵌入的角度，采取这种个体与地域的双重视角，有可能从对个体的社会资本与个体既有的地位结构、居住的社区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既可对Wilson的社会孤立论进行检验，又可以通过对特殊群体的社会资本来源的研究而对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问题进行补充、完善。

从实践上，有利于对贫困的治理实践进行指导。中国原有的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实际上是国家全能理念的产物，忽视个体及其生活所在地在贫困缓解的影响作用。而国外的贫困治理实践表明，需要重视包括社区、个体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因此，如果我们采取个体与社区的双重视角，将可以对个体及其所在地在贫困缓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全面了解与评估。这种双重视角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在贫困治理中的个体及其所在社区的作用与作用机制，从而有利于我们在今后的贫困治理实践中采取多向度的思维，进一步明确贫困治理中的国家、社区和个体之间的角色定位，有利于通过新的政策导向(例如社区发展政策、个体发展政策)动员包括社区、个体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弱势群体生存与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 【1】 保罗·斯皮克尔.贫困与福利国家——揭开“神话”的面纱 [A] .后福利国家 [C]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 287-289 页.
- 【2】 刘玉亭等.国外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J].现代城市研究，2003.1.
- 【3】 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 [J].社会学研究，2002.3.
- 【4】 周彬彬.向贫困挑战——国外缓解贫困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保罗·斯皮克尔.贫困与福利国家——揭开“神话”的面纱 [A] .后福利国家 [C]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 287-2.
- 【5】 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 41-43 页.
- 【6】 Massey DS& Denton NA.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67-168.
- 【7】 段敏芳.弱势群体如何走出贫穷的恶性循环 [J].财贸研究,2002.5.
- 【8】 Duneier M. *Slim's table: Race, respectability, and masculinity* [M].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1992.
- 【9】 Nightingale C. *On the Edge: A History of Poor Black Children and Their American Dream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 【10】 Newman KS. *No Shame in my game: The working poor and the inner city* [M]. New York: Knopf & Russell, 1999.
- 【11】 Wilson WJ.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M].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1987.
- 【12】 Rankin B.H & Quane J.M. *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the social isolation of inner-city African American*[J].Social Forces, 2000, 79(1)P.139-164.
- 【13】 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 [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年，第 47 页.

- [14] 刘中起、风笑天.整体的“社会事实”与个体的“社会行动”:关于迪尔凯姆与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逻辑基点比较 [J].社会科学辑刊, 2002.2.
- [15] 周业勤.从实体到关系: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困境与超越[J].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4.
- [16] 刘江涛, 田佑中.从二元性到二重性---吉登斯对社会学方法规则的超越[J].河北学刊, 2003.3.
- [17]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18] 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A].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C].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
- [19]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20] 郭毅等.人际关系互动与社会结构网络化 [J].社会科学,2003.8.
- [21] 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2.
- [22] 萧俊明.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与文化再生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 1996.4.
- [23]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P89.
- [24]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 [M].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 P.170-173.
- [25] 黄平.安东尼吉登斯: 结构化与现代性[J].国外社会学, 1995.1.
- [26] 李猛.从帕森斯时代到后帕森斯时代的西方社会学[J].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6.2.
- [27]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P.335-336.
- [28] 周志山、许大平.基于实践活动的使动性和制约性:吉登斯结构二重性学说述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5.
- [29] 李红专.当代西方社会历史观的重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述评[J].教学与研究, 2004.4.
- [30]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P.330-336..
- [31] 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A].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C].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
- [32] 桂勇、陆德梅、朱国宏.社会网络、文化制度与求职行为: 嵌入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3.
- [33]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 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 2004.3.
- [34] Small M.L., Newman K. *Urban poverty after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rediscovery of the family, the neighborhood, and culture*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 (27)23-45 .
- [35] Sampson RJ, Jeffrey D Morenoff, Thomas Gannon-Rowley . *Assessing "neighborhood effects": Social processe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28:443-478.
- [36] Shinn M.& Toohey SM. *Community contexts of human welfare*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3; 54,427—459.
- [37] Ainsworth J.W. *Why Does It Take a Village? The Mediation of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J].Social Forces.2002, 81(1):117-152 .
- [38] Jnecks C& Mayer S. E.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in a poor neighborhood.[A] in M.G.H. McGeary & E.L. Lawrence(eds.) "Inner City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C],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c Press, 1990.

- [39] Farrell S.J, Aubry T.& Coulombe D. *Neighborhoods and neighbors: Do they contribute to personal well-being* [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4, Vol. 32, No. 1, 9–25 .
- [40] Narayan D.& Pritchett L. *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Jul 1999; 47,4 .
- [41] Grootaert C. 1999. *Social Capital: The Missing Link?* [C]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No. 3,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
- [42] Grootaert C. *Local Institutions,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 [C]. LLIS Working Paper, No. 6,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9.
- [43] Grootaert C, Gi-Taik Oh& Anand Swamy.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Outcomes in Burkina Faso*[C].LLIS Working Paper, No. 7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999.
- [44] Grootaert C. & Narayan D. *Local Institutions, Poverty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Bolivia*, [C].LLIS Working Paper ,No. 9;;,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0.
- [45]Grootaert C. *Does Social Capital Help The Poor?* [C].LLIS Working Paper, No.10,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1.

Rethinking the sociological paradigms in poverty study

LIANG Ning-xin

(Sociology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006, China)

Abstract: Two popular sociological paradigms in poverty study,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paradigm, are briefly reviewed. After explor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embedded within these two paradigms, we argue for understandings of poverty that go beyond these two paradigms from an embedded structure perspective, a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dvances in poverty study from combining personal class structure approach with community's structure one to urban poverty analysis and policy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poverty study ; structural paradigm ;cultural paradigm; embedded structure perspective, community's structure approach;

收稿日期: 2007-4-19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2BSH039)

作者简介: 梁柠欣(1969-), 男, 广西来宾人,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¹ 按照倪志伟 (Victor Nee) 的市场转型理论, 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 (权力贬值假设), 以及提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 (人力资本升值假设), 必须看到的是, 上述社会转型理论对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居民是否也适用, 仍然需要进一步检验。参见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年, 第 18 - 21 页。